

※書刊評介※

評張季琳著《臺灣普羅文學的誕生 ——楊逵與「大日本帝國」》

垂水千惠著 劉怡君*譯 陳瑋芬**修正

本書內容分爲第一冊（本論）和第二冊（註、附錄）兩大部分，第一冊內容爲第一章到第九章以及補章，共十章節。以下簡介各章內容並論述本書的意義。

第一章〈楊逵研究之概觀〉，張博士整理了歷年關於楊逵的研究史，強調楊逵文學的重要性。首先，張博士在第一節裏評論楊逵所創辦的雜誌《臺灣新文學》。她認爲《臺灣新文學》「提出了許多嶄新方法，而這些嶄新方法都是當時臺灣所未曾見的」，「因此，考察戰前的臺灣文學，特別是討論以日文創作的文學時，楊逵絕對是當中的首選」（頁2）。她並說明楊逵作爲「第一位登上日本內地文壇的臺灣籍日文作家」所代表的意義。第二節至第四節中，張博士介紹了日本、臺灣和中國的相關研究文獻。這份相關文獻一覽表頗有意義，對於今後楊逵研究的貢獻也極大。但是如果考慮日本研究者的方便，則希望不侷限於概覽臺灣的研究，而能針對某些重要論文的內容，以概觀整個研究的流變。

第二章〈楊逵的生涯及其時期之劃分〉，如題名所示，張博士將楊逵的生涯以年譜的方式介紹，並區分爲九個時期，加以解說。本章如張博士本人所述：「爲方便讀者閱讀而作。」（頁10）內容簡潔有力。提供進一步的線索，幫助讀者理解第三章之後各章節中的論述，在楊逵生涯的各個時期中所佔有的地位。在此附帶說明張博士所區分的時期如下：楊逵誕生到臺南第二中學退學爲止，爲第一期（1905-1924）；東京留學時代爲第二期（1925-1927）；農民運動時代爲第三期（1927-1932）；臺灣文藝聯盟時代爲第四期（1932-1935.11）；《臺灣新文學》時代爲第五期

* 劉怡君，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生。

** 陳瑋芬，本所助研究員。

(1935.11-1937.9)；首陽農園時代為第六期(1937.10-1945.8)；臺灣光復到因「和平宣言」入獄為止，為第七期(1945.8-1949.4)；綠島時代為第八期(1949.4-1961.4)；假釋出獄到辭世，為第九期(1961.4-1985.3)。

如果將本書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作為序論，則將焦點放在普羅文學的第四章至第七章，應是本書的重心所在。其中第三章和第八章，是考察論述與楊逵因緣深厚的兩位人物——沼川定雄與入田春彥。整體來看，我認為其中最出色的應是第八章〈楊逵的魯迅受容——臺灣普羅作家和總督府日本警官〉。日本警察入田春彥雖然帶給楊逵極大的影響，但其生平經歷卻完全是一團迷霧，經由張博士精密的調查而得以解明。本章曾作為一篇專論〈楊逵和入田春彥〉，發表於《日本臺灣學會報》第一號（一九九九年五月），受到廣大的注目。張博士也因此於二〇〇一年六月，榮獲第一屆日本臺灣學會獎（文化文學言語分野）。

第三章〈楊逵與沼川定雄——臺灣普羅作家和臺灣公學校的日籍教師〉的論述方式，與張博士的代表作〈楊逵和入田春彥〉有共通之處。楊逵由於和公學校時代的日籍教師沼川定雄相遇，而「大大地改變對日本人的觀點」（頁48）。但是這些都是藉由楊逵本身的回想而得知，從來不曾有人研究過沼川定雄的經歷。張博士首先與沼川的遺族取得聯繫，才得以瞭解其經歷。根據其訪查的結果，得知沼川定雄為美國福音路德教會，於一九一〇年所創立之九州學院的第一屆畢業生。對於渡海到臺灣之後的沼川定雄的足跡，張博士不僅到沼川在臺灣任職的學校展開調查，並詳細地翻閱調查當時《臺灣教育》、《臺灣民報》、《臺中州報》等當時的資料，因而徹底查明一九二七年臺中一中發生罷工事件時，沼川定雄正任職於臺中一中。張博士又和沼川任教臺中一中或其他學校時所教導的學生們取得聯絡，因而知曉沼川懂得臺語，也受到當時臺灣學生的景仰。張博士也分析沼川發表在《臺灣教育》的短歌、小論等作品，因而考察出沼川定雄的文學觀和思想傾向是「和臺灣人維持著相互敬愛的關係，另一方面也嘗試逐漸同化臺灣人」。對此，張博士認為「如果沼川定雄的確是與臺灣人站在平等對待的關係上的話」，那麼「他應該對當時總督府的治臺政策，抱持極為懷疑的態度」，張博士並對沼川定雄作了以下結論：「背負著矛盾情結的、善意的在臺日籍教師。」（頁56）

張博士紮實、穩健的實證研究方法是本書最大的特徵。坦白說，筆者認為張博士耗費龐大的時間和勞力，而僅釐清兩者間的影響關係：「楊逵所蒙受最大的恩惠，就是他可以自由地閱覽沼川定雄的藏書，盡情閱讀國內外的文學作品。」（頁

56) 似乎有點美中不足。但是在近來理論優先的文學研究中，張博士謙虛的態度，的確是一股清流。如果更進一步地要求的話，筆者希望張博士對於沼川定雄足跡的考察，不僅侷限於他和楊逵的關係，而希望張博士也從教育史、思想史的角度，考察受過基督教系學校教育的沼川定雄，以日本人的身分渡海來到臺灣和以後成為普羅文學家的楊逵的相會，以及他們交錯而過的軌跡。例如一九二七年臺中一中罷工事件當時的沼川定雄，與處身於東京的楊逵作一比對，或許可以更增加論述的深度。張博士今後的課題，就是如何將經由實證而判別的事實，構築出楊逵實像。

第四章〈「送報伙」及其獲獎〉、第五章〈楊逵與《臺灣新文學》〉、第六章〈《臺灣新文學》時代的楊逵文學〉主要論述楊逵以作家的身分登上文學舞臺的過程。本書的書名之所以題名為《臺灣普羅文學的誕生——楊逵與「大日本帝國」》，主要是依據第四章至第六章的內容而來，亦是本書的主要內容。首先，第四章裏，張博士詳細解讀刊載楊逵〈送報伙〉一文的日本普羅文學系統雜誌——《文學評論》，並介紹同時代作家和讀者對〈送報伙〉的評價。第五章介紹楊逵創辦《臺灣新文學》時期，臺灣和日本文壇的交流。第六章則是以同時期的楊逵評論文章為中心，分析楊逵的文學觀。根據張博士在第二章所做的區分，這時當為楊逵生涯的第四期、第五期。

由於筆者主要研究的是與楊逵幾乎在前後期登上《文學評論》雜誌的呂赫若文學，因此對本書第四至第六章抱有極濃厚的興趣，老實說也因此而比較嚴苛地評論張博士的著作。張博士努力介紹的《文學評論》等當時日本文學的相關資料，是筆者已經相當熟悉的書籍，因此筆者較關心的是以分析的角度切入，而不是將它當作資料來運用。本書提出的諸多資料，對於臺灣的楊逵研究者有極大的貢獻，這樣的成就絕對不容忽視。除了強調上述諸點外，另外提出幾點意見供張博士參考。

首先，張博士並未將《文學評論》放在普羅文學史上加以定位，而以《文學評論》當作評價楊逵的基礎。這點是筆者覺得稍嫌不足的地方。如同張博士本身在補論中所提到的（頁 188），該雜誌創刊時正好是一九三四年日本普羅作家同盟（ナルプ）解散的時期。因此，若要將《文學評論》作為評價普羅文學作家楊逵的基礎，則張博士必須對普羅文學先作定義，且這又和作品〈送報伙〉的評價不可分。在張博士對楊逵和普羅文學家的相關描述中，我們無法得知張博士如何藉由理解〈送報伙〉一文，來評價楊逵的普羅文學家地位，這也是筆者覺得較遺憾的地方。眾所周知〈送報

伏〉的前半部刊載於一九三二年的《臺灣新民報》中。一九三二年與《文學評論》發行的一九三四年之間，有二年的差距，對普羅文學的變動來說，這二年是非常重要的。題目上標示著「普羅文學」，卻沒有論述一九三二年以前普羅文學運動對楊達的影響。如同張博士在〈補論〉中引用楊達本人的說法：「我把當時的《文藝戰線》、《戰旗》等雜誌讀得一字不漏。」（頁 187）依筆者之見，在〈送報伏〉或是評論〈藝術屬於大眾〉中，都反映了一九三〇年前後廣受議論的藝術大眾化的論調。

張博士以楊達的評論文〈藝術屬於大眾〉為主，評述《臺灣新文學》時代的楊達，其文學觀是「不斷重複其單調的信念」、「單純的藝術觀和狹隘的視野」。但是楊達的優點，難道不也正是因為他在日本普羅文學家總轉向的時代中，還能夠愚直地遵守一九三〇年代的信條嗎？我認為這正是作為「臺灣」普羅作家的楊達所不能讓步的界線，也是「日本」普羅文學所沒有，而「臺灣」普羅文學得以發揮其獨特性的原因之一。正因為有這種的獨特性，使得張博士在第七章裏所描繪的受挫的楊達像，更顯得深刻。

筆者對於張博士往後的研究抱持極大的期待，因此求全責備。張博士在第八章大大發揮其本領，筆者心中的遺憾也因此消失。這樣的感覺也曾出現在第三章討論沼川定雄的文章裏。張博士藉由詳細而實證的調查，重新描繪那些原本可能被歷史遺忘的人物形象，其筆致之精彩可見。入田春彥成為「赤化」警官，一度被逼得走投無路，以及他將最後的希望托付楊達後，走上自殺一途等情形，都藉由張博士穩健的筆法，生動地描繪出來。本章不愧是張博士的主要作品之一。除了研究魯迅對楊達的影響外，筆者也希望張博士能繼續研究入田春彥的友人，如本書中已列舉出名字的田中保男、中山侑、藤野雄士等人。這三位日本人和臺灣文學有極為深厚的關係，在許多場合中都可以看到他們的名字，但卻尚未成為研究的對象。既然已經知道他們和普羅文學之間深厚的關係，就應該更進一步釐清這幾位人物的來歷，而使得以楊達研究為首的臺灣文學研究能更上層樓。

以上是筆者對張季琳博士著作《臺灣普羅文學的誕生——楊達與「大日本帝國」》內容的概要說明及簡單的書評。雖然筆者不斷評價張博士所採用穩健、富於實證的手法，最後還是必需提及張博士出色的日語能力。現今臺灣文學所面臨的重要課題，就是如何跨越語言的障礙，可以說本書理所當然地成為跨越語言障礙的最佳證明。為了造福臺灣的讀者，筆者希望本書能以中文版刊行於世，並希望屆時能更大膽地描繪出清晰的楊達像。